



米兰·昆德拉

一曲“生命之轻”的颂歌

——解读《庆祝无意义》

刘凌



《庆祝无意义》书影

米兰·昆德拉的这本小说，确实不容易读。不过，我却难以苟同它只“为高智力者而作”之论。昆德拉曾不无自豪地宣称“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”，其形式创新确有炫耀技巧和故弄玄虚之嫌。《庆祝无意义》将此发挥到了极致。诸如主题思想的复调性，情节、场景的跳跃性和碎片化，人物的随意变换，梦幻、隐喻、象征的错综编织，语义双关乃至多关，等等；还有那个他自己也说不明道不清的神秘“七”段结构——从而酿成一幅似真似幻、扑朔迷离的怪诞图画。这也许避免了过于直白和一览无余，但由于陌生化过度，又形成严重的阅读障碍，令读者头疼不已。西塞罗指出：“浑然天成，不着痕迹，才是真正的艺术。”傅雷则说：“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，最美的字句要出自自然，好像天衣无缝。”昆德拉小说距此境甚远。

小说译者关于书名翻译的话，或许能给读者解读小说提供一点启示。马振骋先生说：“‘la fête de l'insignifiance’，直译应该说叫‘无意义的节日’，如果这样就只有一层意思了。我认为‘fête’（节日）这个词应作动词词，取‘庆祝’之意，才能表达原文的双关含义。连着读‘庆祝无意义’是一层意思，断开读‘庆祝，无意义’又是另一层意思（就像‘喝酒，没意思’一样），大家多读几遍就能体会到了。”“无意义的节日”中的“无意义”，是指无用、无价值之意；而“庆祝无意义”中的“无意义”，则指非神圣的日常性之意。这两层意思，或许可以用小说的一句话表述：“不要操心上面的事，身处下面才快乐。”

昆德拉一直十分推崇隐喻的作用，主张“通过隐喻揭露真相的闪光”。“fête”（节日）一词就具有隐喻性，既指一般的节日，也暗指诸如“聪明”“善意”“爱情”“理想”“革命”“人权”“历史真实”之类纯洁性、真理性、神圣性事物。小说通过情节、场景显示，这些事物都是无用、没意思、无价值的。达德洛的生日聚会，就是一个只是吃吃喝喝、吹捧主人的“无精打采的集会”；乌克兰一家新歌剧院的开

幕典礼不过是“苏维埃国家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场快乐、疯狂与狂欢的喧哗”；救阿兰母亲的青年，竟被母亲溺死，证明救死扶伤的无意义；本想自杀的阿兰母亲，竟又放弃自杀，表明个人意志的不可靠；杀人的女人好好活着，而被称为“天使”的夏尔母亲却命悬一线；心怀善意、主动道歉的阿兰，却老是成为“输家”、“赔不是的人”；刚给丈夫送葬的拉弗朗克，“哭红了眼照样还笑”“化悲痛为欢乐”，嘲讽着爱情的忠贞；斤斤计较真理、卖弄聪明和口才的达德洛，令人讨厌，让女人敬而远之；轰轰烈烈的苏式“革命”，不过是一场唯意志论的闹剧；各类乌托邦理想，不过是飘忽不定的小羽毛；作为真善美象征的“天使”，也是死后才能见到的无性别的虚无幻象；人们满怀希望的千禧年，则是扼杀唯一性、个性的“重复性”时代；关于斯大林和加里宁的历史剧，只是一个取乐观众的“偶像剧”笑话罢了；革命歌曲《马赛曲》合唱，也只是一场儿童娱乐而已。正因如此，小说通过人物对话，提出了“不必认真对待”的人生应对策略。

而小说的最高人生追求，则是个人的“好心情”。“好心情”从何而来？来自不“操心上面的事”，“不认真对待”那些宏大叙事，而真诚体验“下面的快乐”。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就十分肯定与阿兰、拉蒙、夏尔、凯列班四位朋友的“友谊”。因为他们都厌弃那些“节日”性、神圣性事物。阿兰反对重复性、一致性，向往个体性和多样性；肯定斯大林非革命的温情；怀疑主动道歉的作用；与女友保持思想距离；珍惜个人私密空间。拉蒙厌弃盲目从众的人群；在一致性中保持个别性幻觉；肯定自由自在的生活；反对完美无缺；赞赏无意义生活。夏尔鄙弃不懂得笑话的“革命”时代；怀疑历史真实性，承认异代人不同历史观的合理性；不相信“天使”和美好未来。凯列班主张戏剧与生活有别，将个人感情带入演出；认为任何玩神秘都毫无意义；主张在游戏中寻开心。在作者看来，“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，它

是智慧的钥匙，它是好心情的钥匙”。被人们视为“无意义”的自在逛公园，独处，与朋友谈心，玩个小游戏，随心所欲地表演，装腔卖傻讨好，找女朋友随便玩玩，与人为善地和解，儿童天真的笑容，这才是能给人“好心情”、真正有意义的美好生活。而反过来，“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人类的永久的愚蠢，从而发笑”，进一步认识到那些人类“无意义”的“愚蠢”追求。

至此，我们便可了然，昆德拉说“无意义”是“生存的本质”，并非否定人生的一切“意义”，而只是否定那些过于高调的、绝对化的“单一真理”，他称之为“媚俗”的事物。在他看来，所谓“媚俗”，就是“付出一切代价，向大多数人讨好，服务于既成思想，把既成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”的“一种自我欺骗、自我满足”的“感情浪漫主义”。用国人熟悉的语言说，就是一种“假正经”“伪崇高”。他所肯定的，则是包括“友谊”“同情”等在内的个体真诚、朴实的“好心情”。其实，这不过是昆德拉小说贯穿主题的新发展罢了。作者早期小说《玩笑》，就已经提出人“为什么活着，世上有什么意义”这一根本问题。但前期作品中的人物，还都经历着在“轻”与“重”、“有意义”与“无意义”之间无法取舍的痛苦。一方面，渴望着从一切“非如此不可”的“重”中解脱出来；另一方面，又很担心“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，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些什么”呢？“一个人要是不能严肃地看待任何事”，那么他的人生是否就“会过得很可悲”呢？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就发出疑问：“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：哪一方是积极？沉重呢？还是轻松？”其书名就显示出对“生命之轻”的“难以承受”。不过，《玩笑》中的人物，就已流露出以欢欣鼓舞、轻松宽慰的心情容忍鄙俗也即“无意义”的倾向；《可笑的爱》也开始怀疑“爱情”的纯洁性，只是尚未成为主调罢了。而到新作《庆祝无意义》，却有了根本改变，作者一生

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：他坚决选择“轻”、“鄙俗”和“无意义”，而且还要“爱它”、“庆祝”它了。

为什么说“无意义”是“生存的本质”呢？小说通过人物对话，给出了几条理由：人类“没有一个出于自己的意愿来这里的”，“一切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”，“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拥有权利”，因而“就实在没有理由斗争或者写那些什么宣言了”；“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，不可能改造的，也是不可能阻挡不幸的进展的”；“大家都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建立的一座座天文馆上远距离交谈”，因而“不可能达成真理共识”；“即便是最美好可笑的事也逃不过衰老的规律”，“辛辛苦苦玩神秘毫无意义”；“死的人变成死了很多的死人，没有人再记得他们，他们消失在虚无中”；极少数名字“留在记忆中”的人，“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，真实的回忆，他们也变成了木偶”，“没有人有权利凭一个木偶去创作一个人”；夏娃生产出人类本身就是个错误，因为“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苦难”，因而期盼“人的完全消失”，“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”……在这里，显示出昆德拉小说的哲学偏好，需知他真正的大学专业是哲学啊！可惜，昆德拉只是个蹩脚哲学家。他似乎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“虚无”“荒谬”和“厌烦”情绪，以及海德格尔关于死亡乃存在最确定的可能性等思想；却缺乏萨特那种“自由选择”的责任担当和积极介入政治又不为党派束缚的进取性独立。老实说，小说并不适合表现诸如“生存的本质”这类抽象哲学主题。上述“无意义”的哲学论据，也大多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。

昆德拉的本色是艺术家，音乐家艺术的长期熏陶显然影响巨大。叔本华曾说：“音乐是有限形世界完全独立的，完全无视有形世界的，即使没有世界也能够存在于某一形式上存在的。”这当然过于夸张。但作为抒情艺术的音乐，确实具有强烈主观化、情感性特征。这就使昆德拉习惯于从个人直观和情感好恶角度观察世界、历史，并诉诸小说创

作。这使他不像马克思等人，将人的本质视为“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；也不像巴尔扎克“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”。这也使他看不到塞万提斯、卡夫卡作品实以荒诞形式表现真实社会关系，而误以为只是“个体”、“我思”的颂歌。他的创作方法，也就不可能是现实主义，而是他青年时代就热衷的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。昆德拉声称“小说不研究现实，而只研究存在”；所谓“存在”，又只是“存在的可能性”。因此，昆德拉小说的人物、情节和场景，就均非从现实提炼，而是在“在很多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省，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认识”，或“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”。作者通过这种“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”，“揭穿即刻现实中的神秘的欲望”，追求一种“激动情感的即刻的真实”（均为昆德拉语）。小说就是描述作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“存在的可能”，但“存在的可能，是否会变为现实，并不重要”。这就使本意“复归生活世界”的小说，又远离了真实的“生活世界”。为了图解观念，甚至不惜违背起码的生活真实。如阿兰母亲杀死救命恩人的情节，就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的随意杜撰。为了表现“认识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捉摸”，昆德拉还热衷于描写“没有原因和目的的动作”；于是就出现了有违人情常理的达德洛“无法理解的谎言和无法理解的笑”。

以“人民”名义肆虐的斯大林主义对昆德拉及其祖国的伤害，尤其是入侵布拉格，给作者留下了深重的伤痕。正是这一经历，使他日益亲近多样化和个人自由与权利（“轻”），而排斥“单一真理”；与任何政治、宗教、意识形态、道德和集体相认同的立场（“重”）；并自觉抵抗“对一切大恐怖抒情化”也即“媚俗”的企图，确立“一个清醒的、看破世事的目光”，鄙弃一切伪崇高。

伽达默尔认为，20世纪的哲学基础，乃是“对一切独断论、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有的怀疑主

义”。昆德拉对政治、道德、思想独断论的否定，对“个人、特殊思想、私生活的尊重”，确有一定历史合理性。但哲学家昆德拉却未能处理好普遍与特殊、必然与偶然、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，而将特殊、偶然和相对绝对化，将个例乃至特例混充一般与本质。只要是“真理”，就不可能是纯粹“个人”的。也不能因为有“媚俗”性的伪崇高，就抹煞一切神圣与崇高。“个体”与“群体”、“为己”与“为人”，是人类的永恒矛盾，二者互相依存并转化。《犹太法典》格言谓：“我不为己，谁来为我？我只为己，我是什么？”人既要独立生存，又需融入群体；既借助他人而生存，也为他人而生存。因此，个人应“既独立又不与世界脱离”，个体自由也“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”（弗罗姆《逃避自由》）；“真正的‘生活意义’，必然是‘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，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’”（阿德勒《自卑与超越》）。

人类故然需要关注自我之“轻”，也要关注诸如良知、正义、责任、义务、民族、祖国、友谊、爱情等等之“重”。弗兰克尔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一书，就“从责任中看到了人的存在的真正本质”。而昆德拉却每每将“轻”与“重”、个体与群体对立起来，说什么“成为个人，就是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‘一致同意’”。其结果，必然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膨胀，群体凝聚力丧失，社会动荡加剧。这种恶果，在最为“自由”的美国已经出现。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员迈克尔·沃尔泽在《论宽容》中就指出：“美国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分离的个人”，已使工会、慈善团体等社团人数下降，“突发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”；他认为，“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共同行动要比离群索居好”，能使个人“学会深思熟虑，学会争论，学会决策并且学会承担责任”，并避免“精神空虚”。

早在上世纪末，弗洛姆在《占有还是生存》中，就尖锐抨击“极端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”，认为这使“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：孤独、恐惧、抑郁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”。昆德拉小说排斥群体认同，追求个人“好心情”的价值取向，却与流毒世界的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灵犀相通，这正是许多中西读者青睐它的根本原因。昆德拉声称：“小说是引人发笑的！不要把一切都看得这么认真！”但作品实际社会作用，却未必如此。昆德拉小说“不认真对待”、只求个人“好心情”的人生态度，是否会成为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支撑，瓦解集体主义和公共参与的腐蚀剂呢？

确如已故美国历史学家彼得·盖伊所说：“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”。（《启蒙运动》）优秀的文学艺术，应该关心民众疾苦、人类命运，提升、振奋国民精神，成为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和灯塔，而不应该像昆德拉那样，仅仅为“相对性陶然而醉”，为“无肯定而享奇乐”（昆德拉语）。艾德勒、范多伦指出：“就算我们真的要逃避现实，应该也是逃避到一个更深沉、更伟大的真实里”（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）昆德拉似乎没能提供这种“真实”。因此，我赞同《洛杉矶时报》尼克·罗密欧的评判：“这不是一本精彩的书。”



CNR 中国广播报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

《中国广播报》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，是走过60年风雨历程的广电行业报。她立足全国广电前沿，面向全国受众，依托各级地方电台和各地记者站，搭建广播业务交流平台。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
邮编：100866

订阅请到当地邮局 邮发代号 1-8

- 订阅热线：010-86095309
- 每周二出版 每期24版
- 定价：3元/期 全年144元



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，即可轻松订阅全年《中国广播报》